

顧亭林

與

● 趙 俚 生 著
● 齊 魯 書 社

王山史

顧亭林與王山史

1104535

顾亭林与王山史

赵 俪 生 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 7.75印张 2 插页 141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

书号 11206·118 定价 2.20 元

前 记

这本书的名字，原该叫《顾炎武与王弘撰》的。但是考虑到“王弘撰”这个名字偏生僻，知道的人太少，倒是他的别号“山史”比较为人所知。所以决定用号；可是王既用号，顾亦应随之，所以“炎武”就只好换用“亭林”了。

书中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曰《顾亭林新传》，一曰《王山史年谱》。

《新传》云云，寓有二义。其一，用以区别于三十一年前我所写的《顾炎武传略》，那本小册子，今天再看已经很不像样了，三十年不是很短的时间距离，人总在进步吧。其二，用以区别于将来我终归要写的《顾炎武大传》，只要天假以年，这个心愿终有实现的一天。那么，《新传》恰是过渡期的产品。

《年谱》和《新传》在体例方面很不相同。《新传》是带发扬阐微性质的作品。《年谱》是纯考据式的，单纯让材料来说话。这个作品，我经营它已经超过四十年了。我是很喜欢拿文章出去发表的人，单单这个作品我一直压在手头不肯拿出去，也不敢拿出去。致使

国内国外颇有几位对清初明遗民活动非常感兴趣的先生们写信来打问此书的出版情况，我无可对答。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但仍要说明，其中某些情节，还只好用“失考”二字过关。嵇文甫先生给它写的《序》，已是三十八年前的事，嵇老逝世倏已二十又二年，那么《年谱》的问世，就献给先生的在天之灵吧。

亭林与山史是密友，二人事迹互相牵连处很多，所以拿这两种作品汇为一书出版，也是合情合理的。

作 者

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日于益州

目 次

前 记

一、顾亭林新传

我为什么总在写顾炎武的传？

——代序 (3)

新 传 (9)

附 录

顾炎武与张尔岐 (103)

二、玉山史年谱

嵇文甫序 (119)

年 谱 (121)

附 录

一、清初关中二李一康诗之比较的分析… (223)

三、清初关中学者故里访问小记 (236)

校稿后记 (241)

DB74/22

一、顾亭林新传



我为什么总在写顾炎武的传？

——代 序

有人问：你这一辈子为什么总在写顾炎武的传？我试来回答这一问题。

第一个理由是，我崇拜这个人。崇拜他什么？既崇拜他的“学”，更崇拜他的“行”，特别是他的“行”对他的“学”的反作用，很多学者达不到这一点。很多学者写顾的传，大都偏重在“学”上，对“行”，特别对他的“学”“行”关系，触及不多。我要来补足这个缺陷。

并不是说顾的一切我都爱。不是这样。他的一些脾气，我很不喜欢。譬如他在山东章邱大桑家庄买了一千亩地，惹出了一场文字狱，张尔岐好心劝他放弃了吧，他回信态度很不好。又他在山西祁县戴廷栻（枫仲）家丢了几百两银子，是戴的儿子偷去捐了一个什么小官。顾追着要偿还，李因笃又劝他算了吧，他回信态度又很不好。这种在钱财上寸土不让，我很不喜欢。再譬如，对宋明理学，我丝毫不菲薄程、朱，但我又高度欣赏阳

明。陕西的东林派学者冯从吾(少墟)是程、朱派，但他一再说阳明的“致良知”三字“泄尽圣学千古之秘”。这句话我欣赏极了。但顾炎武则骂王派后学李卓吾为“人彘”。什么是“人彘”？我想就是“狗矢可以肥田，人矢可以喂狗”的人矢吧。骂人骂到这种地步，何苦来呢。

不喜欢只管不喜欢，我仍然非常崇拜他。也举两个例。譬如，《音学五书》中的《唐韵正》一书，是我崇拜到五体投地的一本书。齐白石愿在徐文长、吴昌硕门下作走狗，我于顾氏《唐韵正》亦然。动用几百条证据来证一个古音，还夹有实地调查所得，如山东青州以东读“家”如“姑”，三原、泾阳间读“朱”如“周”等等，这种考证比乾嘉考证有力量多了！跟考证谢三宾有几个孙子，更不堪以道里计。可是顾是在怎样环境下写了这种高乘的科学专著的呢？是他过江到北方以前、仆仆于南京、王家营、清江浦一带，那时他改装成商人，换了姓名，夜里在大通铺上跟一些莫明其妙的人挤一个睡觉的铺位，饿了找一点锅底下的剩羹喝喝。还做秘密活动，跟人约好在什么地方秘密接头。在这种情况下做出那样的专著，试问谁能办得到？再譬如，他曾和马驥（宛斯）到邹平城外五里去找一块柴荣时候做过“中书侍郎同平章”官职的人叫景范的墓碑，具体落实景范不是景延广，因为景延广在历史上名誉不好，景家后代曾为此受到笞刑，顾炎武替他们做了昭雪。像这样具体的学术调查活动，那些乾、嘉大官僚学者们肯去这么干

吗？他们不过是从书本到书本，而且是幕僚们做实际工作，他们出名。

第二个理由，我原籍山东，抗战前期在山西打过三年游击，后期又在陕西当了八年中学教员。顾经常活动的地方，我也活动过。我有时读时下一些同志写的顾传，看写到山东，只写逛了崂山又逛了泰山，仿佛他是单纯为了旅游似的。写到陕西，连李因笃《受祺堂》诗集和文集，正刻和续刻，几乎没有接触。顾的终生好友王弘撰《山史》，不但他的三个“日札”未曾寓目，就连《砥斋》《山志》也没有接触。这怎么能行呢？江南学者，类多渊博，但于江南文献虽已娴熟，而对北方学术渊源、交接脉络，似嫌生疏。吾，北人也，生于北，长于北，饮食于北，那么为什么不可以蹶然而兴，补此亭林“南人居北”的一段学术因缘呢？这是我平生不断写顾传的又一个原故。

第三个理由，是人的学问越后期越精密。我的顾炎武研究，亦不能脱此规律。孙夏峰（奇逢）说，“七十岁功夫，较六十而密，八十岁功夫，较七十而密”。周亮工的《赖古堂集序》中也引用宁都魏禧（叔子）的话说，做学问有三条，第一条是记览之博，第二条是见识之高，第三条是历年之久。为什么加这个第三条？年轻时候我不懂，年老以后懂得了。做学问也要靠“历年之久”。孔广森很年轻死了，学问很受局限。近人王蘧常先生年至耄耋，故《顾诗汇注》方始如此老练。我个人

从二十三、四岁上做顾炎武研究，闹过不少笑话。例如我遇到两个姓戴的人的名字，都和傅青主、王山史交往很密，很象是一个人，于是在一篇文章初稿中就写下了“戴务旂字枫仲”这样的大笑话。三十几岁，读书渐广，发觉不对头，戴本孝，字务旂，和州人；戴廷枏，字枫仲，祁县人；我把一个安徽人跟一个山西人捏成一个人了。而今已近古稀，回忆往事，犹觉颊间有火辣之感。证明古歌“战战栗栗，日谨一日，人莫蹙于山，而蹙于垤”是真理，做学问就要在这样一些地方小心摔跤子。亡友童书业茶余酒后往往说做文章就怕出“硬伤”，就是这种意思。但年轻时，“硬伤”是在所不免，老来更周密些就是了。

我的研究环境，自己多少年来一直安排得很固陋。专靠自己书房里的四、五架子平装书和三橱线装书。

“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很少到系资料室和校图书馆。今春立志出门读书，在湖北省图书馆读到李良年的《秋锦山房集》，在复旦图书馆读到程正夫的《海古陈人集》和张勇儿子张云翼的《式古堂集》，抚摸着这些康熙刻板的精印书页，心里有说不出的兴奋，和老妻赶快写卡片，竟不觉下班时间的到来。在上海图书馆长乐路分馆又读到潘道根手钞的顾炎武外甥徐元文的《含经堂集》。这一切，都和顾炎武研究密切相关。我对顾的理解，不觉又深入了许多。又在千墩镇上看到《惧谋录》的抄本。学问就是这样一年一年做下去，这样一步一步深下去。

由此及彼，由粗及精，由表及里。但愿在我耄耋之前，
写出一部比较象样的《顾炎武大传》，以作为治此终生不
辍的一种交代吧。

新 传

第 一 章

请读者诸君能够同意我，在全面展开地叙述传主生平事迹之前，先说一点作者对传主的一些总看法。换言之，就是先勾画一个轮廓。有人说，你不会留到最后写？但在前在后，到头来不过是“循环往复”中的一个螺旋。在前，起一种事前的推动认识的作用；在后，起一种总结的推动认识的作用。二者并不相悖。

那么，我们的传主到底是怎样的一位历史人物呢？
我认为——

首先，他是一个爱国的人。爱什么国？这自然有个微观与宏观的差距。用微观来看，他爱的是朱姓统治的封建专制王朝，爱的是吊死在煤山上的崇祯帝。“问君何事三千里，春谒长陵秋孝陵。”^①但用宏观来看，事情就不仅仅如此了。从浸透着他一生心血的著作来看，他是爱着整个社会，一代人一代人生活下去的社会。这社会毛病出在哪里？怎样把它调整的好一些？假如不爱，他就不会这么关心。除此之外，国家和民族这两个概念总

是套在一起的，而他的头脑里又早就装满了“戎狄是膺，荆舒是惩”、“非我族类，其心必异”^②的意识形态，从而使他对满洲贵族统治者不可能不采取排斥与不妥协的态度，这种态度说到头来，是在多民族大家庭的现实和意识还不可能产生的历史年代里，人们对自己原本共同体的一种热爱。从今天的眼光看，它是有局限的；历史主义地看，它是很自然的。一个人，既爱着自己的较狭隘的民族共同体，又爱着自己社会的共同体，那么拐弯抹角地说，他也在爱着人民，这样说恐怕是不算过分的。当然这中间有局限，有些人他不爱，对“犯上作乱”的人他认为是“不仁”的^③，也就是“坏人”。这是他的爱国主义中的阶级局限性。

其次，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终生不停止做学问的人，并在做学问的过程中做出了一条路子的人。现在社会这么进步，科学这么发达，对有学问的人还如此感到宝贵，何况十七世纪？并且，在很多做学问的人当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走出一条路子来。“两脚书架”多得很。但我们的传主，他的创发性很强，走出了很多条路子。调查研究的路子是他走出来的；古韵分部的路子是他走出来的（跟在他古韵十部的安排之后，江永、段玉裁、戴震、孔广森、王念孙直到章炳麟、黄侃，古韵分部的安排越来越精确了）；就是说跟着上古氏族搬迁这件事而来的姓氏复杂化和地名复杂化，也是他看出了苗头。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很多。政治上中央集权太甚。

地方丧失了能动性，中国又是个大国，中央地方权力如何划分又如何配合，这个问题他也接触到了。这样一些学问不是纸上谈兵，是经世济用的。所以有人说，他不是一个人“俗儒”④；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人庸庸碌碌读了一辈子书翻不出筋斗来的人，不是只会吃桑叶不会吐丝的人。有关这方面，别人讲得已经不少，作者在后边的章节里也还要进一步发挥。

再其次，他还是一个活动家。这一点，以往的人讲得不多，而这是很重要、不容忽略的一点。所谓活动家是指两个方面，既指跋山涉水稽古考古的调查研究活动，又指反清复明的若干秘密活动。关于前者，彰彰在人耳目，在此不必多表；关于后者，有人表示异议，进行过驳斥，说是“胡猜”。自然，象第几次秘密会议记录、主席顾炎武、记录王宏撰这样的资料是阙如的，也不可能。但侧面的证明材料却多得很。试问，他的诗句“秦客王稽至此，待我三亭之南”⑤，这不是秘密的单线联系，又是什么？试问，他“混迹同佣贩，甘心变姓名，寒依车下草，饥糝镗中羹，浦雁先秋到，关鸡候旦鸣”，在另首诗里“吊古莫言秦法峻，鸡鸣曾放孟尝回”⑥，他对关隘盘查常有异常心理状态，这是为什么？“三藩”起后，靖逆将军、靖逆侯张勇派他的儿子张云翼（又南）到华阴来“半夜告访”⑦，他的诗里也立刻出现了“寒鸡宿愈高”、“秋风下雀罗”字句，这是为什么？康熙十八年（他六十七岁）到少林寺告诉和